

文 革 博 物 馆 专 集 (七 十 五)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形成同盟的？

• 罗点点 •

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他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9月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像。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1962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地告诉叶群，毛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彪的这篇讲话，你讲不讲得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颌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需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

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党内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格说来，深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 摘自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标题为编者所加。

∞ ∞ ∞ ∞ ∞ ∞ ∞ ∞ ∞ ∞ ∞

关于林彪的回忆

• 张 宁 •

解放后，林彪就称病不出，他亲自手书座右铭：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另一张条幅：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不与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往来，包括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没有人敢唱反调，有人诬陷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就想夺毛泽东权，林彪站出来澄清事实，替彭德怀承担。批判彭德怀，每个人要发言表态，林彪比众人讲话更“绝”：“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反话正说。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前，就考虑到林彪的立场，要大规模的铲除政治异己，必须确保军队对他的效忠，必须掌握住林彪。

“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得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

据林彪身边人说，林彪根本不相信毛会自杀，他对叶群说：“不想活了，还那么左。”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毛泽东开了个小型会议，到会者有毛泽东、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康生。毛泽东要选一个接替刘少奇的人，五人按照毛的提议，各写一条，展示开来上面都写一个“林”，与会者都摸到了毛的心思。

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林彪从大连到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空军司令吴法宪得报赶去机场迎接，本想讨个好，见林彪毫无喜气，脸色不好，吓得话也不敢讲赶紧溜了。（金秋自叙）林彪在北京没有住宅，毛泽东当时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叫林彪也住进去，毛、林住处之间仅一墙之隔。

据林彪身边人讲，林彪去见毛泽东，进门就向毛作揖，托称身体有病，不愿接任新职。毛泽东大怒，骂林彪：“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明朝嘉靖帝，虔信道教，不问政事）严斥林彪：“你不想介入运动是假的！”

运动已开始，社会上已闹得人仰马翻，许多家庭已趋家破人亡边缘，“批判走资派”、“破四旧立四新”正如火如荼。据知情人讲：“两边反差巨大，林彪这边愁云惨雾，唉声叹气；主席那边欢声笑语，莺歌燕舞。林彪对叶群说：‘看他以后怎么收场’。”

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首脑机构，她乱了中央和各

省政府，又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她虽是副职，却起着中心主导作用。

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指示秘书起草《军委命令》，实际上是针对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

毛泽东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废。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

叶群对林彪说：“我说的吧，你还不相信，你的办法行不通。主席怎么说你就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天塌下来有比你高的人顶着。”

违背林彪原意的《军委命令》经毛泽东审批改过以后下达，全军直属机关单位、院校、医院、文艺团体“踢开党委闹革命”，军内造反势力恶性膨胀肆意横虐，冲击军事首脑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残酷揪斗军区各级首长。北京发展到冲击各军兵种总部，甚至国防部，从将军到元帅都被当作靶子。

凡是反对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在一次接见造反派领袖的谈话中，毛突然不着边际的冒出一句：“那个贺龙，到哪都带着枪嘛。”仅此一句，军队最高的元帅阵营开了缺口，军内外造反派气焰更加嚣张，捏造出“带枪的刘邓”、“二月兵变”。毛泽东亲自下令逮捕贺龙，停职审查陈毅。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批件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据看过批件的人透露，“总理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在陈毅的批示上，也没有说好话”。不跟江青配合的朱德、陈云、刘伯承，都在内部做了检讨，从此闲置在家。

军队大乱，各军纷向军委告状求援。听秘书说，叶群做林彪工作：“这个‘火’，是主席点的，你要‘灭’，可要得罪人。几次请示人家不理你，我看你还是把这个球扔给总理吧。”

但是周恩来很快的把“球”踢还给林彪。

南京军区传来许世友盛怒之下可能会开枪杀人的急报，各军区已出现高级将领被斗死斗残的情况。据“林办”秘书讲，林彪看着堆积如山的告急文电，气得脸色发青，说“不能再置之不理”。叶群劝说：“军队开展运动是毛主席批示的，你签的字。要变动，也得先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你不能先自决定，她后面那个人你是得罪不起，我看上面没表示，你就先摆一摆、放一放吧。”

这次林彪没有再理叶群，说：“我是军委副主席，我不管谁管？！”叶群悻悻道：“上面还有军委主席，外面情况他不会不听说，他不表态，你着什么忙。”

林彪召集叶帅、徐帅、聂帅共商对策，制定了九条，呈报毛泽东。之前先呈报江青，江青删除了两条，恰是制止军队动乱的根本措施，即恢复党委领导和禁止全国跨行业串联这两条。剩下七条。毛泽东对江青删除的两条不加置评，增补了一条对高干子女教育问题，七条变成八条，并批示：林彪同志所拟八条很好，照发，还对林彪幽默一句：“还我长城。”

新军委命令的后台是林彪。军队依照命令制止内部动乱，收到显著成效。军队

的稳定影响了地方，全国局势一度趋势于稳定。

江青醒悟为时已晚，向毛泽东告状，说军队是运动的“死角”、“军内走资派反攻倒算”、“还乡团”等等，又通过渠道鼓励各地“受压制迫害”的军队造反派上京告状，“争取参加运动的权力”，并公开提出“揪出军内刘邓路线”、“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等针对军队“反攻倒算势力”的口号。毛泽东对此不表态。新军委命令又一次成了一张废纸，军内造反派再次大规模的冲击军事机关，势如破竹，北京公开揪斗众元帅。

林立衡去见林彪，提出疑问，林彪沉默很久才回答自己的女儿：“政治问题不像打仗，能做出明快果断的决定。”据林彪身边人说“这一番较量，林彪又输了”。还说“哪个将军喜欢坐空营帐”。

国家功臣元老，不论地方或军队，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江青得意之余给叶群打电话，轻飘飘的竟在电话上唱小曲。叶群心中虽然不快，她的丈夫被架空，军委成了空架子，国防部长是光杆司令，但她不得不逢场作戏，陪着江青在电话上哼“小放牛”。据秘书说：“她哼哼叽叽的唱，心里哪会舒服。”

叶群这人，据了解她的人说，聪明得有点“鬼灵精怪”，林彪不问政时期的家居生活，家里家外事无巨细都交给叶群处理，林彪从不管，叶群件件事办得都能令林彪满意，林彪已习惯了依赖叶群。林彪到北京后，叶群处心积虑为林彪设计新形象，有些方面着实过份，群众自发的现象，她都加以归纳提高再推广，并叫林彪带头示范。在崇拜风靡的年代，很有市场。对毛泽东的态度也虚假得让人累得慌，据李处长讲上天安门门的体验，为了表现林彪的“谦恭礼让”，把工作人员累得快倒下。每次上天安门，叶群总提醒林彪“一分钟”，意思是比毛泽东提前一分钟到达，太早到了怕毛泽东疑心林彪抢风头，晚到了更不行，怕毛泽东嫌林彪不恭，所以既早不得也晚不得，一分钟不早不晚恰到好处。这一分钟哪能掌握得好？李处长领着人分四种情况演习：夜里、白天、晚上；人多或人少；交通堵塞时或不堵塞时；车速快或慢；每一趟行车都分秒计算。每趟上天安门，毛家湾就像面临一场大阵仗，要打听出发时间，好掌握最佳的药力发挥时间给林彪服药，一听说毛泽东要出发了，这边就像救火似的搀扶林彪上车。林彪上天安门，就像老太婆的缠脚布，外表光鲜，里面乱七八糟，不但是林彪的负担，也是“林办”的负担。

在对待总主任萧华的问题上，林彪曾一再叮嘱叶群：“萧华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

因为江青紧盯萧华不放，拉住叶群迫林彪表态，林彪对叶群发脾气：“这个女人很讨厌！得寸进尺，坏点子太多，要小心。不要再让她见我。萧华历史上没有错误，红小鬼出身，对待他一定要慎重。”

萧华最终还是被江青打倒了，但是张春桥并未如愿登上总政治部主任宝座，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他在处理群众武斗方面有贡献，后来演化成军队“支左”。

在打倒杨成武事件上，林彪也做了抵制。提议杨成武当总长的人是林彪。毛泽东未表态，叶群说林彪：“你不先摸主席意思就提名，还是在前面加个‘代’字，报上去让主席确定。”林彪听从叶群意见，果然毛泽东批下杨成武当代总长。

江青首先发难要打倒杨成武是不争的事实。林彪限制叶群与江青接触，曾为此夫妻俩争吵过，叶群也要秘书们配合她胡瞒过林彪。叶群也劝过林彪：“江青倒杨的决心大，你挡着，她背后那人你得罪得起嘛！”

林彪发脾气：“你以后少去钓鱼台！总长一个接一个打倒，我这个国防部长还怎么当！任命是我签字，打倒他我怎么说！任命几天就打倒，那个婆娘还把我放眼里吗，不理她！”

叶群挨斥，对秘书吐苦水：“首长对老同志有感情。江青的后台我们惹不起。首长当中拦着不计厉害，真出什么错可怎么办。他整天坐家里不问外面事，我不能不替他操心啊。”

最终杨成武是被打倒了，叶群从中起了很坏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她为了迎合江青，出卖了自己的丈夫。在驻京机关万人批判杨成武的大会上，林彪被骗到会，事先江青说：“主席也去，总理也去。”等叶群劝说林彪到了会场，毛泽东临时取消赴会日程，在毫无准备情况下，林彪被周恩来劝上台讲话。据“林办”秘书们说，“林彪气得语无伦次，讲完话不跟总理打招呼就回了毛家湾”。林彪走后，周恩来上台讲话，并喊出“江青同志万岁”的口号。这个会实际上是江青预谋的打倒杨成武的会，并不是什么批判杨成武的会。因为林彪上台讲了话，打倒杨成武成了既定的事实。

杨成武倒台后，林彪不等江青开口，向毛泽东建议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代总参谋长，毛泽东问林彪：“这个人是不是老同志？”

林彪回答：“是一方面军的老同志。”

毛泽东说：“既然是老同志，就不要什么‘代’了，就让他当总参谋长吧。”

林彪在“文革”中的表现“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他有错也是事实。贺龙元帅受到迫害一案，我曾问过办案人员，“贺龙是不是林彪迫害的？”得到的回答是“贺龙一事与林彪无关”（指下令逮捕关押贺龙）。另据看过批件的人说林彪在贺龙案件上没有一句批示。可是许多“文革”中的大案要案，都扯上了林彪。连毛泽东也说“许多事我不知道，是林彪处理的”。并且亲自下指示为很多冤案平反，许多老干部和遗眷感激涕零。但据接旨平反的官员说，打开档案，上面均有毛泽东亲笔批示。聪明的官员为避横祸上身，凡是上面交代平反的人与事，只照章办理，一律不看档案，全部封存。

毛泽东死后，公审“四人帮”，江青在法庭上大叫：“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的可悲可恶的一句话泄尽天机。

∞ ∞ ∞ ∞ ∞ ∞ ∞ ∞ ∞ ∞

谜一样的林彪

• 佚名 •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十年间，林彪的名字并不多见。似乎，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也离开了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中心。

据说，他在平型关负伤落下病根，解放战争南下时病情加重，怕光，怕水，怕风，拉稀，患的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于是，他称病休养。

但他向来是个勤于思考的人，在养病中，他最大的乐趣似乎是读书。由叶群和秘书帮助，他涉猎的问题更广泛了。他读书的特点是删繁就简，看《共产党宣言》，他一买几本，看一次剪贴一次，几次后剪得只剩几句话，他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一九六〇年十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他曾谈起读书，他说：“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书，不要爬在书下来读书。要批判的读，要吸取的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有些书就是换汤不

换药，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排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像搭积木一样从这块换到那块，就是那么几块板子。”

林彪如果不是个喜欢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是绝然讲不出这样的感受的。

林彪读书驳杂，他看《安娜·卡列尼娜》，说安娜是个真人，做真人很不容易，他看《老子》，说里面充满了辩证法，但不能把人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部队不宜提倡。他读药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他对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尤有兴趣，从中领悟历代开国将帅的命运，考虑如何处理高层领导关系。他的笔记中有“西汉故人以权贵不全、南阳故人以悠闲自保”的话，曾想到到偏僻的贵州当个省长，避开政治旋涡；他在一本名为《曹操》的书上，关于曹操当宰相后，自觉得成“骑虎难下之势”的叙述旁批道：“不要轻易骑上去。”他的室内条幅中有“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等等。叶群记录的他的言论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面带三分笑”等等。这些都令我们窥见孤僻、清高的林彪那复杂的内心世界。

但林彪没有永久地沉寂下去。他终于露面了，终于“骑上去”了。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大幅标题报导了“中共八届五中全会昨日举行”的消息，消息说：“这次会议增选林彪同志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增选了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同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林彪这次露面，比之解放战争时期，地位显然更高了。有趣的是，林彪的当选总有些特殊，他当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四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的；他当政治局常委并副主席，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的；他后来成为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并接班人，则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形成的。

八届五中全会后，因为国防部长彭德怀既不是常委也不是副主席，林彪成为政治局常委及党的副主席，在元帅中的排位事实上已越过彭德怀仅次于朱德，一年后，林彪果然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了，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缜密的安排？可不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庐山会议，林彪也将接替彭德怀？

据《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中记录的党史研究专家于南说：“在‘文革’前毛泽东就考虑过接班人问题。周总理曾对王稼祥说：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看来，林彪接替彭德怀又取代刘少奇，是早有安排的？历史发展的后果是有前因的？

至于林彪，他一向那么清高，又读那么多史书，为什么不一直托病？为什么再度出山？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推测起来，也许是毛泽东批评了他，要他打掉暮气，继续革命？因为林彪曾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这样讲：“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也许，是林彪本人在经过一番读书思考后，认为自己还应该轰轰烈烈再干一场，不甘心在百无聊赖的养病生活中了此余生？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林彪的养病其实是“韬光养晦”，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一九五九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立即采取了与彭德怀不同的办法，他旗帜鲜明地大搞“突出政治”。

林彪说：“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是掌握精神实质；一是掌握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要勤学多练。多练，就是反复地学，学深学透，多实际运用，不要学一下就过去了。”

他说：“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学呢？我向同志们提议，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那么多，里面有许多人名地名你都搞不清。最好先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读化学并不一定找到发明化学的人，学几何不一定要找欧几里德，不一定要读他们的原著；后来的著作，有一些当然不及原著，但是有一些比原著还好，发展了，新的创造很多，……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他又说：“在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一是武器和人的关系，打仗时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是武器要人去使用，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份发挥作用，所以战争的胜利还是靠人。原子弹、炮弹打过以后，到接近敌人几十米时，还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二是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军队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后勤工作，有军事训练，文化教育，等等。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起来了，各种工作就都能做好。从这一环着手，一通百通，”“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中有些是事务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种工作都要做，不能只做哪一个，但是重点要摆在思想工作。”“四是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书本要读，但是重要的是掌握活的思想。”“这就是说，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

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林彪在养病中读书思考，此时终于亮出他丰满光滑的羽毛。他的这些讲话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是林彪的特色。

是啊，谁能说这些话全是谬论呢？追溯到井冈山时代，毛泽东不正是“政治建军”的倡导者吗？共产党的军队在战争中难道不是以弱胜强的吗？那么，光靠武器能打胜仗吗？共产党的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讲难道不是以精神、理想和道义战胜了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吗？毛泽东当年对林彪的这些讲话评价很高，他说：“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然而，谁又能说这些话就是真理，或者真理向前跨进一步还是真理呢？林彪恰恰从这里开始，越来越把政治，把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强调到了极致。他后来在文革中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等等，恰是他过去许多讲话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延续和发展，不但将个人崇拜的狂热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也把林彪自己推到了绝壁上。试问，当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林彪那些话后，如果恰恰是林彪本人同毛泽东发生了意见分歧，他还可能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吗？他提了，就是反毛主席，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曾在笔记中记下“绝则错”三个字，可正是他自己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说绝了，他自己恰恰是“绝则错”。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吗？他为什么要把话说绝？是逻辑上哲学上认识上的错误，还是包藏着某种祸心？

最值得深思的是，不管林彪那些话多么极端，他毕竟是在鼓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况且，一九五九年，正是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之时，在此后几年中，接班人刘少奇在一线十分活跃，毛泽东深感“大权旁落”。而林彪，恰是在这几年里，一如当年在井冈山上支持毛泽东一样，大力提倡毛泽东思想，这种做法同当时的刘少奇恰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对此当然深有感触，所以他要“全国学习解放军”，所以林彪后来得以取代刘少奇。那么，说林彪一九五九年以来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全是假的，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吧？据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撰文，甚至到了“9·13”前夕，九月八日，林彪还对张宁说：“你应该认真研究文艺理论，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高屋建瓴地对文艺理论和方针，提出自己的见解。”据说这天林彪已经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所传达的命令办”了，但他却还在对未来的儿媳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假装吗？可他有什么必要这时还用马列主义词句迷惑张宁呢？再者，九月七日，当张宁刚到北戴河见到林彪时，叶群问林彪，对张宁和张清霖满意不满意，“林彪拍着手说：‘很满意，一个老红军的女儿，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这同那一代老干部对子女婚姻的见解有什么两样呢？——不是共产党对国民党、对“美帝”、对“苏修”、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搞到这样的你死我活，箭拔弩张，要政变，要谋杀，要叛逃——“9·13”事件深刻的悲剧性正在这里。

∞ ∞ ∞ ∞ ∞ ∞ ∞ ∞ ∞ ∞ ∞

大漠沉戟廿九载 林彪事件仍是谜
·刘黎儿·

【东京八月廿一日报导】一九七一年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暗杀毛泽东失败，在逃亡时坠落于蒙古身亡，林彪事件至今仍然是个谜。将于明天上市的（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 Sunday 每日》独家专访了前蒙古外交部次长永栋（译音），永栋当时系在现场负责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官员，在事隔卅年后的今天，他终于打破了长年的沈默，透露了苏联与林彪逃亡的关联，虽然许多中国专家无法相信林彪与苏联有暗渡陈仓的关系，但是永栋指证历历。

◇ 失事坠机原因 众说纷纭

报导指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左右，中国大陆全境的雷达均拚命在追踪英国三叉型喷射运输机“二五六号”的下落，该机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之后，便一直朝西北飞，在起飞后一个小时左右飞越“中蒙”边境，进入蒙古国境，搭乘该机的便是毛泽东称之为“最亲密的战友”、并指名为接班人的党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及其妻、儿子，结果“二五六号”机在蒙古离乌兰巴托约三百五十公里之处的罕惕县温都尔汗冒火燃烧，此项事实，中共系于一年后才正式承认。

林彪当被认为是暗杀毛泽东失败，在逃亡途中坠机身亡，包括林彪篡位、造反计画在内的一连串的“林彪事件”，至今仍留有相当多的谜，林彪之死为“事故之死”似乎已成定论，但是亦有传说指飞机系遭击落，抑或机内曾发生相当炽烈的枪战等阴谋说亦不断在流传著。

《周刊 Sunday 每日》专访了从一九七〇年起担任蒙古政府外交部次长廿年的永栋，永栋现年七十三岁，在担任外交次长之后，曾任驻日大使，于九二年引退，永栋表示他对林彪坠机时状况记忆犹新，因为对他而言，是毕生最大的一个事件，永栋在退休多年之后终于打破沈默。

永栋当时负责处理在蒙古境内冒火燃烧的林彪事件的善后问题，他说“我是在飞机墮落后的翌日的七月十四日清早接到联络的，蒙古国内的情报机关表示，中国

的一架中型喷射机侵犯领空，十三日下午二点半，堕落在罕惕县，机体燃烧，机上有女性一人，连飞行员共九人均告死亡，当时我判断这是相当大的事件，随即与军方及有关部会组成一个对策小组。”

永栋并表示“蒙古是苏联之后第二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坚持自己是老大哥的立场，在蒙古境内约有七万苏联的驻军，另一方面，当时中苏对立，还发展到武装冲突（一九六九年，珍宝岛事件），与中共的关系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当时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我国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我国系循声而追踪的。”

永栋当时为了搜集情报，因此传唤中共大使许文益。

◇ 中共大使交涉 几近吵架

永栋描述他所见的飞机失事现场状况，“机内枪械散乱，也发现了一些军方的文件，死亡者多穿著军服，很明显是军机，我当场向许文益抗议说“中国军机侵犯我国领空，至为遗憾”，许大使则只是一再坚持说‘这是民航机，因为机器故障而堕落，希望贵国能归还遗体。’几乎等于是半吵架状态了。我要求他透露搭乘人员的名字，但未能得到回答。”

永栋并说“驻扎的苏联军行动相当快，随即将三叉机的三个引擎中的一个拿回去，但是当时他们对于九人的尸体或身分完全没兴趣，此外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亦未有机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因为引擎、仪表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场是宽广的草原地带，地上留有长达八百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测该机系拟准备降落，但是因为土质过软，途中机体陷落，机翼折断而引发爆炸起火；总之飞机失事并不是如坊间所传的原因，系因降落着陆失败所致。”

永栋并指出，“在机内并发现有军用航空地图，地图上从河北省北戴河穿过失事现场，一直画线画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目的地是当时与中国为不共戴天之敌的苏联，显见该机并非因为迷失方向而飞到蒙古；当时在操纵室里有两个高度仪，一个是该机从巴基斯坦购入时便已经安装好的普通的高度仪，另外一个专门用于低空飞行的特别的高度仪，当时算是苏联制的最尖端仪器，苏联当时并未供应给其他国家，即使是同盟国的蒙古。该仪器看来完全是在事故发生不久前装置的，也发现有俄文的说明书，当时与苏联严重对立的中国军机中为何会备有苏联制的高度仪，我当时便百思不解，觉得有疑问。”

◇ 苏联处理态度 令人难解

永栋同时指出“苏联的行动也令人难以理解，九人的尸体于失事一周之后被埋葬在现场附近的丘陵，但到了十月，苏联的K G B（国家保安委员会）高官去到当地，从林彪的尸体拿走了头部，过了几周后，又切割了胸部，这是因为林彪曾停留在莫斯科，接受过结核病与牙齿的治疗，因此苏联是拿回去与病历表比对一番。”

“周刊 Sunday 每日”报导指出，在九五年产经新闻曾拿到苏联共党的秘密文件，显示苏联曾比对过尸体，确认为林彪无误，根据永栋的说法才知道原来是用头部与胸部，不过有关死者身分，苏联也一直未向蒙古说明过，永栋本身是在七一年年底从香港的报导才得知机上有一人是林彪。

◇ 双方暗通款曲 并不奇怪

永栋表示“吃惊的同时是此一报导与苏联当时一些无法理解的行动吻合，苏联虽说一开始对尸体并不感兴趣，但是苏联显然从很早便得知机上有林彪，此外机上装备有苏联制的高度仪，进入六〇年代后，中苏对立激烈后，林彪依然与同为军人出身的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相当亲密，因此林彪当时亦与苏联偷偷保持联系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周刊 Sunday 每日》指永栋是谨慎地拐了弯发言，即在当时“中”苏对立状况下，林彪与苏联高官，尤其是军方互相保持有联络；蒙古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宫田修则表示“当时中国正是文化大革命最为火热时，不断激烈地批判苏联，林彪是因为依附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而爬上二号宝座的，这样的林彪会逃亡到苏联去，事件本身有疑问，但是永栋的证言及高度仪的存在是很值得探讨的”。

另一位中国问题权威的专修大学教授冈部达味则认为，“像林彪这样的主流派的层峰很难想像会私通苏联，如果说最后一瞬间的逃亡对象国选择苏联，则可以理解，因为这是当时社会主义人士的想法，至于有苏联的高度仪，很可能是从罗马尼亚或北韩等入手的”。

永栋认为，“林彪事件已经过了三十年，埋在飞机失事现场附近的林彪的尸体，经火葬后，现在永眠于乌兰巴托市内的墓园，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对我国说明该机有谁搭乘，事故是发生在蒙古，俄国也一样，中、俄两国均有责任对蒙古国民公开事实真相，尤其苏联当时拿了头、胸部而去，至今未归还，照会了好几次，都未得到答覆，对蒙古而言，此一事件至今未了。”

□ 据《小参考》2000年8月21日

~~~~~  
【青春有悔】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丑陋的老三届

• 刘 双 •

（续上期）

三．丑陋的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控诉文革的罪恶。好像在那场持续了十年的浩劫中只有四个人在作坏事，而其余十亿减四的人都是受害者，都是无辜的，清白的。于是历史上的“文革”失去了载体。但是，如果这个载体确实不曾存在的话，“文革”就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发展。对“文革”的反省应该是全民族的。既包括执政党也包括老百姓。“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没有善待他们，他们也没有善待历史。“老三届”在“文革”中有被欺骗和利用的一面，但是，主动迎合，积极参与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看过电影《淮海战役》的人都会记得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台词：“60万比80万（解放军和‘国军’人数之比）……这是在赌国家的命运，赌民族的命运。‘咄’的一下押上去，就是那么一回事。”在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是胜利者，是赢家。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手中的“赌资”是什么？最大的“赌资”当然是他在老百姓心中早已形成的，如日中天的崇高威望。但是，仅此一注是不够的。无论输赢，在各类码子中，有一注是注定要输进去的，这就是“老三届”——他们的青春和前程。

## ◇ 丑陋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毒焰首先是在大学校园被点燃的。但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压下，“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12）发表后形成的轰轰烈烈的局面，很快变得冷冷清清。于是，毛泽东走出滴水洞，在畅游了长江，回到北京之后，他作了两件一反常态，惊骇全党的事情。一是写下了《炮打司令部》（13）的大字报，向全党公开了他要打倒刘少奇的决心。一是亲笔给清华附中红卫兵（14）写回信，表明他老人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政敌和同盟者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可以由他任意号令，招之即来，挥之则去，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将中学生推向政治斗争的最前沿确实有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用。

中学生的年龄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一个从身体发育到心理发育都尚未达到成熟的年龄段。青春的躁动、是非的无断、理念的易变，再加上抖擞的精神和旺盛的精力都表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年龄段。教育学和心理学都认为，中学生是需要特别加以引导和训教的一群。英文中有一个特指处在这样年龄段的人的专用名词：teenager。它是由teen和age复合而成。可是，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合名词，只在表征处在该年龄段的青年的年龄特征。更深层的内容在于涵指这个年龄段的人在教唆和误导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一种反复无常、丧失理性的倾向，因而是极端危险的。文革中的“老三届”正是这样一个群体。

历史对“老三届”的选择看似偶然，但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建国十七年以来，以革命传统和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培育了“老三届”以仇恨为底色的社会情感，“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这种情感的宣泄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五七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和斗争愈演愈烈，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普遍认同。这种反文化的倾向对“老三届”影响是极为可怕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都是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还可以接受的前苏联和东欧的文化到了六十年代也成了修正主义的东西。“老三届”的精神世界近乎一片荒漠。“文革”前夕“老三届”只能接受以《收租院》（15）为代表的控诉艺术和以《红岩》（16）为代表的烈士文学。前者对“老三届”的影响是将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转变成对人的仇恨，后者是把信仰的追求转变为对复仇的渴望。在不断地、反复地对“人性论”进行批判的同时，“老三届”接受了日益深化的个人崇拜教育。其中，学习雷锋的运动（17）将个人崇拜的方式进行了推陈出新，学习毛主席著作也由此走上实用主义的道路，对毛泽东的神话莫过于在“老三届”的心中。

从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开始全面抨击党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方针政策。文化部被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宣部被喻为“阎王殿”；评价最低的是教育界——“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文革”前，“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谈话”、“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给“老三届”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以抨击现行教育体制的讲话一经流传，不尊敬老师，不崇尚知识之风即刻成为一种时尚。“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报》曾刊出过一篇嬉笑之文《获取5分的“秘诀”》（18），它的作者就是“文革”中的“老三届”。这篇文章比黄帅小姑娘的日记要早了将近十年。把它算作是“老三届”泼向自己老师的第一盆污水可能是不会有误的。北京市东城区某校初一的学生在1966年初曾写出一文，题目在当时就非常吓人——《现在的学校培养不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其矛头还是对准了教育体制和老师。无论是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哲学观点的批判，还是对田汉的“有鬼无害”的戏剧理论的批判，“老三届”都积极参与，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文革”风雨未到，“老三届”已经跃跃欲试。政治思想的“热身”运动已经完成于无形之中。

“文革”中的“老三届”是红色的“teenager”。以红卫兵为代表，以“八一八”为起点，“老三届”呼啸着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检阅红卫兵。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有一千万以“老三届”为主体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这里接受过他的检阅。“八一八”是“文化大革命”这出中华民族的悲丑剧拉开大幕的时刻。那红色的古城楼就是一座历史的舞台。无论以后如何，或寿终正寝、或横尸荒野、或腊炬成灰、或面壁囚笼，剧中的主角都从幕后走向台前。刘少奇的尴尬，周恩来的矜持、江青的傲慢、康生的阴冷，尤其是林彪那白骨般的面容和他嘶声力竭的呼喊，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来说充满着险象和凶兆。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举起手，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而他的目光却没有投向在他脚下的芸芸众生。端详那张由摄影师留下的，记载着那历史瞬间的照片，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微昂着他硕大的头颅，把他冷漠的目光投向无际的苍穹。与这种情形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红卫兵的狂热，他们欢呼着、呐喊着走过天安门城楼，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天安门广场。这种场面与1933年1月30日柏林的火炬之夜（19）何其相似。

红卫兵不分男女，都身穿黄色的旧军装。不知是天太热的缘故，还是故意要摆出这副样子，每个人都捋胳膊挽袖子，刁蛮之像让人兵痞难辨。男的是清一色的小平头，女的多是超短发，也有的女红卫兵将自己剃成一个秃子以示革命。不知她们是怎样将革命和消灭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封建意识形态中男尊女卑的思想和带有宗教色彩的禁欲主义倾向那么自发地而又自然地毒害着少女的心身。如果当时可以做变性手术，这些女娃子们会毫不犹豫地躺到手术台上去的。站立时双手插腰。说话时国骂不离口，本来没有骂人习惯的人为了显示自己已经不再温良恭俭让，也要在讲话时生硬地带上几句“他妈的”来。走起路来乍着胳膊，象一只只横行霸道的螃蟹。而远远望去又更象一片专门啃噬绿叶的蝗虫。这是一股真正黄祸。它的肆虐虽然时间短暂，却在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极其丑陋的一页。

红卫兵这个短命的怪胎一降生到这个世间就发出了两声惊世的怪叫：一声是“造反有理”；一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 ◇ 丑陋的口号

其实，第一个讲“造反有理”的是毛泽东本人。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寿辰的大会上发言，其中说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这种抽象是否科学、严谨是值得推敲的，即使是面对陕北的庄稼汉。二十年以后，在清华附中红卫兵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造反有理”四个字被重新诠释。今天重读三论《造反》，其立论之荒谬，论据之牵强，论述之无理当不必说。值得探讨的是：文章的作者小小年纪，吃了十八九年的粮食，书只读到中学，事还没有作成一件，那里来的如此了得的傲慢与嚣张。他们贵为金枝玉叶，既没有人压迫他们，也没有人剥削他们，到底有何反可造？

解放初期，有人曾告戒干部子弟要以史为鉴，不要重蹈满清八旗子弟（20）的覆辙。这种告戒固然用心良苦。希望干部子弟不要堕落当无可指责。但这种期望是以认定干部子弟应当享有特权为前提的。事实上，这种特权从共和国建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着。在如何对待下一代的问题上，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摆脱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帝业子承的世袭观念，代之以天赋人权、平等竞争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一种奢望。干部子弟从小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平常百姓家的孩子。和八旗子弟一样，他们是特权阶层，是精神衙内。傲慢与偏见简直就是与生俱来。没有人敢于无视和怠慢这种骄狂。但是，“文革”的实践证明，这种骄狂导致的行为比起他

们的沉沦和颓废给社会给国家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的多！干部子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中生活条件最优越，政治待遇最特殊的一个群体。社会对他们的娇惯养成了他们感情用事、为所欲为的性格。当“文革”来临之时，他们本来有条件凭借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所获得的便利去准确地揣摸领袖的用心所在，去理解“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句话浅显的内涵，从而避免在这场以打倒自己父辈为第一目的的“革命”中的充当冲当冲锋队的角色。然而他们只是凭借自己想象去理解甚至企图左右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他们带上红卫兵的红袖标，高喊“造反有理”的全部意图就是要借“文革”之机，向社会向人民索取更大更多的特权，使自己不但可以享有凌驾于同龄人而且享有凌驾于全体人民之上的权利和地位。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干部子弟的这种骄狂。因为这种以无知和任性为特征的桀骜不逊不可能逃出忠君思想和个人崇拜的阴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大的阻力来自一个社会正常运作所必须具备的秩序和法统。按照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领导人产生和废黜的程序，就无法打倒刘少奇和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用贫民造反的模式可以置一切法规于不顾。但是在共产党的天下谁敢举旗造反呢？地富反坏右不敢，知识分子不敢，工人农民也不敢。历史选择了红卫兵。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中，毛泽东肯定了“造反有理”的口号，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多，喊得最响的纲领性的口号。党纪国法，伦理道德在这个口号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从此，造反的祸水流遍全国，运动也从“有序”走向“无序”。

但是，中学红卫兵的失宠来得之快是连他们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红旗》杂志十二期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中曾高喊“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万岁！”，可是，从“八一八”到《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21）发表不足100天的时间，“小将们”就从辉煌的颠峰上滚落下来。少爷小姐们也曾为此闹得乌烟瘴气，鸡飞狗跳，可是“造反有理”的接力棒还是不得不交给平民出身的，与“走资派”没有太多血缘关系的蒯大富和王大宾（22）之辈。然而，属于“老三届”的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喊“造反有理”的口号，自觉地为这场浩劫推波助澜的历史“功勋”，堪称丑陋之最，是应该被写入史书的。

#### ◇ 丑陋的对联

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现代血统论的代表作。虽然谭力夫（23）极力兜售此货，但是它的主要市场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校园。身为儿女，人皆有父母。对联的咄咄逼人在于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人可以选择。

现在还无从考证是谁，也没有人出来表示自己应该享有对对联的发明权。但它是“老三届”的专利是不会有问题的。辛亥革命55年之后，如此荒唐的玩意儿在当时北京的每一所中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封建主义的破烂货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社会主义正统思想的殿堂，究其根源，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关，与以“自来红”自称的干部子弟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入党的爷娘头脑中还没有得到改造的农民意识有关。

解放以后，渗入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大背景的社会教育深刻地影响了“老三届”。“文革”前夕，中学生之间已经没有友谊可言，人性的失落已见端倪。在很多学校已经出现“出身好”的同学自觉地、有组织地排斥、打击“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倾向。人为地挖掘阶级的鸿沟，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对象。“文革”的到来，“对联”的出现，使上述情况恶性发展，最终演变成一场新种姓歧视的丑剧。

面对高悬的对联，非“红五类”（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

，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的人格和尊严丧失殆尽。革命的诱惑与血统的卑贱在扭曲他们的人性。有一个女孩把社会对她的歧视转变成对母亲的仇恨，在对母亲拳打脚踢之后，勒令母亲跪在地上，用剪刀剪去了她的全部头发。笔者的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为了表明自己脱胎换骨的决心，不止一次地在对联的辩论会上狂喊：“我就是个混蛋！”行文至此，他那张无血色的小脸，不知所措的眼神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不敢想像他是如何缝合这精神的创伤的。耻辱莫过于精神的自残。“文革”的丑恶可见一斑。

对联的出现使青年人本应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抽象为对革命的图腾崇拜，而本应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境界的革命被转变为对家庭出身的攀比和计较。有的学校高干子弟云集，红卫兵组织将革命干部的标准定为：行政级别13级以上，入党时间在38年以前的人。于是，有一大批本来可以在人前显贵的干部子弟硬是被推入“职员子弟”的行列被搞得灰头土脸。而那些根正苗红，将别人斥责为“狗崽子”的“自来红”们的好景也不长。最大的讽刺莫过于这些“自来红”们的迟钝使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正是他们日夜引以为自豪的老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才发现自己正在完成一个被自己的逻辑所认定的，由“好汉”向“混蛋”的转变。

“对联”问世不久，“老三届”中不是“混蛋”的人已寥若晨星，还真有点“池浅王八多”的味道。直到1966年10月，才因“对联”的荒谬实在是显而易见，才由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24）出面讲了几句无关痛痒的话。但是，血统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毒化人们的生活。

遇罗克烈士（25）因反对“对联”，撰写《出身论》而惨遭杀害。他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他的血溅在“老三届”的身上、手上。遇罗克是中国20世纪后50年中出现的最勇敢，最杰出的思想者。他的绝笔“乾坤持重我头轻”一定会流传下去。但是他和他的诗不属于“老三届”。

今年是11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地为世人所认识。在纪念它的日子里，人们似乎忽略了三中全会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摘去全部地主、富农份子的帽子，称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对于他们的子女来说，作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个决定犹如“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们终于可以挺起胸、抬起头和其他人一样在共和国的同一片蓝天下自由地呼吸。勒在上千万“剥削阶级”子女及其亲属头上出身不好的“紧箍咒”被摘掉了。以“出身”界定人的优与劣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 ◇ 丑陋的作品

红卫兵不但有自己的口号也有自己的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好恶。

32年前，红卫兵自己创作的以宣传造反精神为主题的歌曲简直多如牛毛。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强音悍调也渐渐地被人遗忘。可是，有一首歌笨拙的旋律还经常出现在影视节目中。《造反歌》是“老三届”给历史留下的又一“杰作”。它的词曲作者不详，但它的“诞生地”应该是北大附中。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所谓“黑帮”是1966年四、五月期间的《人民日报》对“三家村”（26）的称谓。后来被用来泛指所有被认为有必要被打倒的人。所谓“见阎王”就是夺人性命。不管“说党不好”的人讲得是否有道理，也不管是说党在某一个方面或是在某一个时期作过不好的事情还是说党在全局性的问题上有过不好的决策，总之，



都要夺其性命。后来的事实证明，歌词中的誓言并不只是一种意愿的夸张表述，而是实际行动的写照。其实，这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并不是“老三届”的发明。“老三届”只不过是受到了林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种讲法的诱导，鹦鹉学舌罢了。在“老三届”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法制教育是一个盲区。杀人夺命之事无需法律条文的认定，也不需要司法部门的核准，“文革”中他们就是这样作的。诗言志，歌也言志。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同父辈的《毕业歌》相比，《造反歌》是败笔。

中学红卫兵的思维走向和他们的价值取向多是通过大字报和自己办的报纸来表达的。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的数量是不可计数的，但是没有留下记录，除了少数极端作品，如《三论造反》之类。而红卫兵办的报纸刊物虽然屈指可数，但保存下来的数量却很可观。一张大字报的出现往往与作者的个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有关而带有随机性，而报刊上的文章却要经过一群人的讨论比较能够反映一个群体的意志。出现在北京的红卫兵报纸有《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27）等。这些报纸除了顽固地、不厌其烦地贩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狗皮膏药之外，还有一个喋喋不休的宣传主题，就是“镇压流氓”。红卫兵对流氓的关注始于红八月，而到了他们失势以后，向人民群众高喊一声“镇压流氓”也可以使自己心态趋于平衡。任何一位政治家，任何一个有理念的政治派别都不会把镇压流氓看作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件什么要紧的事情。更何况毛泽东。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镇压流氓”扯在一起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红卫兵心目中的所谓流氓是指那些家境贫困，上不起学而又没有固定工作的社会青年。红卫兵对这些本应得到社会救助和同情的同龄人倾注了极大的仇恨看似难以理解，其实也很正常。说到底还是血统论——那个社会的新种姓歧视在作怪。

提到红卫兵的刊物应该提一下1968年初出现在北京中学校园的油印刊物《准备》。《准备》与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极端分子有关。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早在一年以前就显露出水火不相容的态势，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是“文革”中出现的第一支反江青的政治派别。但是，在读过《准备》的全部文字之后，就会感觉到这份与“联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刊物的指导思想是混乱的。《准备》在它的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纪实性政治小说，它被放在首篇的位置，小说的标题也是《准备》。小说以康生等待毛泽东批准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准备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素材。小说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的景致，表明了作者的身份非同一般干部子弟，作者在小说中借康生的头脑所进行的思维和当时官方对搞“文革”的必要性的解释没有任何不同。小说用尽美好的辞藻把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描绘成一位忧国忧民的，与领袖肝胆相照的旷世之才。小说是这样结束的：通向主席办公室的红色电话响了，他（小说一直没有说出康生的名字）大步跨了过去，拿起电话说：“我是康生”。康生在“文革”初期通过他的老婆曹轶欧组织北大哲学系师生给校党委贴大字报以捞取政治资本的勾当在当时也不是什么新闻。康生，被外国人称为龙爪的人，在红卫兵的刊物上被喷涂、被神化恰恰说明红卫兵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决裂只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而不象有些人自吹的那样，是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对峙。

在“极右”的红卫兵思潮之后，“老三届”中浮现出来的“极左”思潮也同样没有挣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罗网。《一切为了“九大”》（上海）、《中国向何出去？》（湖南）、《论新思潮》（北京）、《今日向何方》（广西）等文章的出现表明，“老三届”中已经崭露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这个倾向的尽头就是无遮掩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疯狂和歇斯底里使“中央文革”都感到恐惧。这种疯狂也被有些“老三届”自吹为反“文革”的先知先觉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种自吹自擂尤其表现在最近国内外出现的一股研究“文革”异端思潮的热浪中，其作浪者的多数还是文革中的“老三届”。

## ◇ 丑陋的行为

红卫兵思潮的出现是一代人思想混乱的总爆发。而思想的混乱一定导致行为的疯狂。

“八一八”之夜，躁动的红卫兵为了报答领袖的召见之恩，为了实现建立功勋的梦想，他们迫不及待地向“旧世界”宣战了。数不清的事例证明，所谓“破四旧”（28）的锋芒所向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多少古迹被破坏，多少文物被焚毁。不肖子孙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这种行为不只是丑恶而是一种罪恶了。

在八月的红色恐怖中，人们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残杀地富反坏右人员及其家属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

北京六中位于中南海东侧、天安门西侧、人民大会堂南侧。在“红八月”中，六中红卫兵在校园里设立的“刑讯室”，曾恶名远扬。对“阶级敌人”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甚至将滚烫的开水倒在一位76岁的老工人的身上，在老人的残叫声中红卫兵们和以魔鬼一样的嚎笑。

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也是历史的见证：鲜血染红了舞台，鲜血染红了幕布。舞台上上演杀人的活剧，舞台下爆发出嗜血者的欢呼。

首都红卫兵在大兴县向地富份子及其子弟举起了屠刀。被杀死的人，最年长的80岁高龄，最年幼的仅出生38天。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人家。

这种杀人的游戏，以“红八月”为始端，在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愈演愈烈。广西省出现的“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公然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的口号，肆意杀戮“四类份子”和他们的后代；湖南省道县、邵阳县等地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屠杀地富及其子女。

打、砸、抢、抄家之风刮遍全国。中国社会的基本人权指数已接近零。住在协和医院宿舍的一青年孕妇在“红八月”被抄家时同时被强奸，施暴者是革军子弟，年仅14岁。如果“文革”博物馆真的建立，应为“红八月”独辟一个展室，让后人不要忘记这即丑恶又凶恶的一幕。

如果说制造“红色恐怖”是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那么对教师的人身和人格的侵犯则是“老三届”的群体行为。“老三届”在“文革”中最先攻击的对象就是曾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和厚爱的老师。学生对老师的侵犯是全方位的。辱骂，批斗，殴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有些学校的“老三届”甚至将老师活活打死。例如，原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实验中学）的校长卞仲耘女士（29）就是在本校的操场上被一群十六七岁的女中生活活打死的。这种学生将老师打死，逼死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事情。许多经历过“文革”的老教师提起往事仍然不寒而颤。有人说“老三届”是用狼奶喂大的，这种比喻并不过份。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不断进行的对“人性论”的批判使“老三届”缺少爱心，崇尚兽性。一旦土壤适合，就会开出血淋淋的恶之花。遗憾的是，“文革”过去32年了，“老三届”中没有人出来认领和忏悔这一份罪恶，向老师们，向死者的家属，向全社会说一声对不起。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

1998年夏天，原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三届”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再次回到北京。和前几次一样，她是为在“文革”中被打死的中学老师而来。早在20年前，她曾去探望被她的同学打死的老校长的家属。她是唯一一位来探望死者家属的师

大女附中的学生。10多年前，她在《女性的野蛮》〔30〕一文中再次重提往事，作为围观者“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过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这是来自老三届的第一声忏悔，只是声音太微弱了。卞校长的死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是什么东西驱使着她对自己发出如此强烈的自责呢？是一个人的没有泯灭的良知。说“老三届”是丑陋的，是因为在“老三届”中象这样良知未泯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历史却让他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在回忆和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时，往往使他们的内心产生阵阵的疼痛。他们不能忘却那如烟的往事，但在公开的场合却要回避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话题。历史是不好随意涂抹的。“文革”中展现出来的也并不只是某些个人言和行的丑陋，而是全民族的弱势和劣根性。消灭这种弱势，铲除这种劣根性必须从每一个人作起。文过饰非不能根治民族的顽症。

#### 四．请做如是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老三届”也不例外。探寻这些代表人物的足迹可以窥见和理顺“老三届”思想的脉络。这些年来，偶尔也能读到一些他们回忆往事的文字。但是其中流露出来的忏悔之意不多，炫耀之意不少。最近，我曾从朋友手中得到陈永康（笔名：咏慷）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青春殇》。我抱着极大的兴趣，用十个小时，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之时已是深夜。陈永康先生当年与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同为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因反对工作组名震京城，有“中学蒯大富”之美称（反工作组的蒯大富与刘少奇的大女儿刘涛同为清华大学的同学）。作者是当年政治旋涡中的人物，他曾因与“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为政敌而中得“大彩”，今天他却没有采用回忆录的形式，直述当年的往事和今天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而是采用了小说的形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许有他的难言之隐。而整部小说的文字，以《后记》中的表述最能概括作者对自己，对红卫兵运动和“老三届”的评价：

“他们虔诚地在信仰的祭坛前奋斗牺牲，坚韧地在灵魂的炼狱中忍受熬煎，向往献身，期待着历史的承认。他们火热的革命热情，对祖国前途，对人类命运‘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恐怕会永远载入史册，另人感奋。”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应该坦率地承认，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失望了，深深地。

“文革”过去三十年了，写出这样的文字，能向历史交代吗？

不知陈永康先生当年的“战友”、现居美国的何芳芳女士对“文革”的认识停留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我在猜测。

也许，再过一些年，能够看到以下曾经有着全国影响的“老三届”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写出的，有着较高境界的文字，一定会感到“非常有趣”（“老三届”作家王小波的习惯用语）。而另一方面，又很有一些人，以“成功者”最为典型，无视这些“代表人物”的历史存在，不承认这些“代表人物”的典型性思维和言行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老三届”的世界观的基本轮廓，以证明自己在那场浩劫中做到了洁身无垢。这种辩白实在是多余。

这些代表人物是：

1965年撰写《获取5分的“秘诀”》，北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宫小吉；

1966年6月给党中央写信主动要求停课闹革命并自愿放弃高考的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的部份“老高三”的学生；

1966年六月在清华附中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的卜大华，骆小海和王铭；

1966年8月18日代表北京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大附中“老高一”学生彭小蒙（女）；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将其名字“彬彬”改为“要武”的，原师大女附中“老高三”学生宋彬彬（女）（31）

1966年9月组织起来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首领，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孔丹；

1966年“八一八”之夜起草《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也曾代表首都红卫兵在天安门上讲话的，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冯晓新；

1967年春天，由“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的“北京中学生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领导成员：北京25中“老高三”学生李冬民，北京二中“老高三”学生刘龙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老高三”学生陈永康，清华附中“老高三”学生刘刚（女）；

1967年在《四·三战报》创刊号上撰文《论新思潮》的作者（原良乡电校学生）

1967年秋天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十男十女”；

1968年在湖南因撰写《中国向何出去》一文被判有期徒刑10年，原长沙一中“老初一”学生，现在居住在澳洲的杨曦光（现名杨小凯）；

“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孙立哲（北京），董良弼（北京），丁爱迪（北京），朱克家（上海、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蔡立坚（北京，女，已故）；柴春泽（辽宁）（32）

1973年在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考试中“交白卷”并力呈“知青”现状的张铁生（辽宁），

精神病患者，朦胧诗开山之作《相信未来》的作者，北京某中学学生郭路生；

原北京四中“老高三”学生，朦胧派诗人，现居住在美国的赵振开（笔名北岛）

1976年1月在《人民日报》发表长诗《理想之歌》的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部份“工农兵”大学生）；

还有：

1966年在广州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王希哲；

1966年在“人民大学附中”参加红卫兵，现居住在美国的魏京生；

等等，等等。

## 五．结束语

有人曾用“青春方程式”〔33〕这种时髦的提法来涵盖“老三届”复杂的青年时代。如果一定要用数学语言来描述“老三届”心路历程的话，就应该这样来描述：

这个以时间为自变量，表征人生价值取向的函数不是一条连续曲线。它有着如此多的间断点而显得那样支离破碎。它有着那么多的拐点，表明它的走向盲目多变，前后不一致，尽显其价值观的浅薄和世俗。在它的全部定义域内，只出现过一个绝对值看似辉煌的极大值，遗憾的是它却落在了负值区间，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低谷。它不是一条递增曲线，随着岁月的流逝可以构造起一个令后人羡慕的人生，积累起比物质财富更具诱惑力的精神财富。在这个人生的坐标系中，彻悟是一条无形的渐近线。逼近它需要时间更需要勇气：时间用于思考和反省，勇气用于直面那不堪回首的过去。〔34〕

“老三届”这三个字本身散发出来的历史气息，已不需要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对其进行任何修饰。这一代人的历史形像应该定格了。诸多已经被经过反复推敲后使用的定性句语，例如：“独特的一代”（乐黛云）〔35〕、“最具悲剧色彩，也最为尴尬的一代”（李辉）〔36〕、“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一代”（丁东）〔37〕、“在那邪恶与崇高交织时代中所成长起来的‘老三届’只有他们才在理想境界与创造魄力上与20年代知识分子相匹敌”〔38〕等等，都没有准确地定位历史上的老三届。选择“丑陋的老三届”这样一种清晰而简捷的提法是比较客观、比较恰如其份的，道理很简单，因为那个时代是丑陋的。

我曾将本文的初稿念给我刚上高中的儿子听。念罢，我问儿子作何感想。他沉思片刻，说：“是挺丑陋的。”

低调评价“老三届”就是要具体地，一点一滴地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为了使这民族的悲丑剧不要再重演。（全文完）

注释：

〔12〕“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聂元梓1966年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2日有毛泽东批准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毛泽东将其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13〕炮打司令部”是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下的一段文字。题目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例数刘少奇的所谓“罪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尽显其中。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

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14〕北京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若干干部子弟在圆明园集会成立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写的三论《造反》的文章和毛泽东写给他们的回信都被刊登在1966年第11期《红旗》杂志上。

〔15〕《收租院》：一组大型泥塑。以解放前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采的庄园内的收租院向农民收租的情景为素材，塑造了一群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农民的形象。

〔16〕《红岩》：罗广彬、杨益言的长篇小说，1962年出版。描写国民党特务人员残害、屠杀共产党犯人的故事。

〔17〕“学习雷锋”运动：1963年3月5号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由此开始了学习雷锋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有两种潮流。一是倡导一种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的社会风气；而另一种潮流是以林彪为代表的，提倡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18〕《获取五分的秘诀》：刊登在1965年六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

〔19〕“火炬之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纳粹青年在柏林举行火炬游行。

〔20〕“八旗子弟”：满清皇族分为八旗。正黄旗、正蓝旗、正红旗、正白旗、镶黄旗、镶蓝旗、镶红旗和镶白旗。他们的子弟统称“八旗子弟”。“八旗子弟”在建立满清王朝的过程中冲锋陷阵，功勋卓著。入关后，吃喝玩乐，沉溺酒色，一蹶不振。

〔21〕“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1966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

〔22〕蒯大富、王大宾：均为“文革”中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23〕谭力夫：“文革”中北京工业大学学生。曾发表过鼓吹血统论的讲话。

〔24〕陈伯达讲话：1966年10月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所做的《对两个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结》。其中有谴责“对联”的言辞。

〔25〕遇罗克：“文革”前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文革”中撰写多篇反对“对联”的文章，最著名的是《出身论》。1970年3月5日被北京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死刑。

〔26〕“三家村”：“四人帮”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称谓。“文革”就是以对这三个人的迫害而开始的。

〔27〕《湘江评论》《火星报》《莱茵报》：北京红卫兵的铅印报纸。《湘江评论》出版于海淀区，《火星报》和《莱茵报》出版于西城区和东城区。

〔28〕“破四旧”：1966年8月18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向社会散发、张贴《向旧世界宣战》的最后通牒的传单，开始了席卷全国的“破四旧”运动。1966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转载这份传单。转载时，将原文中过份激烈的言辞删去了。“破四旧”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简称。

〔29〕卞仲耘：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共外围组织。后奔赴解放区。“文革”中以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的身份被本校学生野蛮毒打至死。其骨灰现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中。

〔30〕《女性的野蛮》：散文集《女博士生手记》中的一篇，文章记述了卞仲耘校长被残害的经过。作者王友琴，“文革”中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

〔31〕宋彬彬：1966年时，是师大女附中“老高三”的学生。“八一八”那天以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身份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的袖标。并在1966年8月20日的《光明日报》撰文《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人民日报》第二天全文转载）。全文见附录。

〔32〕孙立哲、董良福、丁爱迪、朱克家、蔡立坚、柴春泽：均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全国性标兵。他们的“事迹”均在《人民日报》上进行过宣传。

〔33〕《青春方程式》：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回忆录。其中收录了50位北京女知青的回忆文章。

(34) “间断点”、“拐点”、“极大值”、“递增曲线”、“渐近线” 属于一元微积分“函数”一章中的基本概念。

(35) 摘自乐黛云为《青春方程式》所写的“序”。

(36) 摘自李辉的《残缺的窗栏板》。

(37) 摘自丁冬的《与李辉书——对红卫兵、老三届的一些反思》。

(38) 摘自尤西林的《文革境况片段》。

□ 原载《黄河》1999年第二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校对:       | 戴捷(美国)  | <cnd-cm@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月边(芬兰)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吕青(加拿大) | <cnd-cm@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cnd-cm@cnd.org>   |
| 《CND》总编:    | 熊波(美国)  | <cnd-cm@cnd.org>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 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ftp://cnd.org/206.135.33.5/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ftp://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hxwz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